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六四期 ——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8d)

【前事不忘】	文革中的叶企孙及其身后	虞 昊
【史海钩沉】	文革中的华罗庚“剽窃陈景润”事件	王 元
【研究动态】	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杨银波
【往事追忆】	追究卞仲耘惨案真凶	敏一鸿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前事不忘】

文革中的叶企孙及其身后

• 虞 昊 • (1)

关于叶企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笔者在《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 2000）中作了一些披露。百岁老人顾毓琇看完该书后，特意从美国致函复旦大学出版社，认为“此书可以传世”。往事逝矣，阅知者何以耿耿于怀？盖因历史常会重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希望这种荒唐事情不再出现，诚如叶企孙曾说过的那样：“善读史者观已往之得失，谋将来之进步。”（叶企孙 1917）

在撰写《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的时候，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领导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便利，特别是将珍藏了 30 年之久的文革中逼供叶企孙的记录和有关外调材料交给我们使用（2）。作者写书，不可避免地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无法公布所有的文字材料，有些地方不得不作删节或隐去某些姓名。为供后人继续从事研究，经作者与清华大学档案馆商谈，已将所搜集到的有关叶企孙的档案材料，包括文字记录、日记、著述、照片，以及作者已写好但暂时不能公开发表的说明等等，全部交该馆保存，并约定应对研究者提供查阅上的方便。

本文专就叶企孙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及其冤案得到昭雪的曲折经过加以介绍，但愿善良的

人们从中汲取教训，绝不能让这种反人类反理性的荒唐事情重演。

一、叶企孙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叶企孙生活简朴有规律，善于养生，年近古稀仍很健康。他在“七七事变”时曾患伤寒，治愈之后近30年再未去过医院，到1965年才办了个医诊证。施士元回忆说，1965年“看到他两腿肿胀，行动不便，但是目光炯炯有神，讲话清楚有力，他对下肢有病毫不在乎。”（钱伟长、虞昊1995，页58—60）

文革开始时他因无官职，故未受冲击，但路遇受到冲击者，他总是主动打招呼，关心和宽慰对方，不怕受牵累。

1967年6月，国家经委、化工部和中科院的红卫兵组织揪斗吕正操时翻出熊大缜案（3），就到北大镜春院76号叶企孙家外调。北大“井冈山兵团”获知，立刻在物理系大楼上挂出大标语“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当时叶企孙的侄孙叶建荣正好来看望，叶企孙对他说“今天我被揪出来了”，还认为自己一生历经坎坷，这点挫折是能经受得住的。

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不甘示弱，马上来人抄叶企孙的家。两大造反派争相游斗这位年届70的老学者，把他押进设在原林学院所在地的黑帮劳改队，连报纸都不准看。叶企孙常利用夜晚看管者不在之时，悄悄溜进物理系一般教师的“牛棚”借阅报纸。

1967年8月19日，叶企孙被迫写出第一份“交代”，北大革委会当即盖上公章转交化工部造反司令部。12月的8、14、19及21日，他又写出四份“交代”，其中14日所书材料上的标题是“我和熊大缜的关系”，有物理系文革会的批语和北大文革组织组的章，被引用较多。

1968年1月，叶企孙去侄子叶铭汉家，说被“井冈山”揪去写交代材料。现在存档的有1月17和22日两份手迹。2月9日专案组逼他揭发钱三强，他却写道：“我对于钱三强的总的印象是：他对工作是努力的，他的思想是比较进步的。”

从2月开始叶铭汉发现叶企孙出现幻听症状，常说“井冈山”的广播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又说“井冈山”和“新北大”两家电台不停地辩论他的问题。被“井冈山”拥戴的革命领导周培源在3月对叶铭汉说，“井冈山”电台没有批叶企孙的广播。

3月30日清晨叶企孙找叶铭汉说，听说吴有训受伤了，急于了解详情。叶铭汉借此机会劝他诊治，就先与赵忠尧联系好，然后陪他去赵忠尧家。赵告诉他，吴有训没出事，是他自己的幻觉，于是他在赵忠尧、叶铭汉的陪同下到北医三院神经科，经诊断为“幻觉症”。嘱他服用冬眠灵，他只服用两天就再不肯吃药了，幻听症状则一直没有消除。

这期间他又在3月25日、4月的15、19及27日写出四份“交代”。

1968年6月2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以CC特务罪名逮捕叶企孙，关入北京卫戍区监狱，还戴上了手铐。他在狱中的情况迄今是个“谜”。叶企孙坚守狱中对人的承诺，顾全大局，至死未吐露一字。只是在1969年11月，中央吕正操专案组持周总理批件，把叶企孙要回北大，交接中北大方面感到有两个问题说不清不好办：一个是叶企孙是以“确切”罪名从北大押走的，现在放回是按继续服刑监外审查呢，还是按“查无实据”释放审查来对待？另一个是其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怎么定？于是吕正操专案组就把提审叶企孙的档案移交北大，算作一种答复吧！

这一来使后人有幸从中窥见文革的部分荒唐内情。

有一份叶企孙写的11页手迹，没有签名和日期，只是每页均有指印，与叶企孙其它有签名的手迹对比，可确认为其本人所写，此件上盖有一长方印章，盖章日期是1968年8月8日。另有8次提审记录，从9月3日到9月7日，其中4日那天连审三次，从早上8点40分起直到晚上10点10分，对7旬老翁连续逼供达14个小时！9月7日叶企孙在每份提审记录上签名并按下指印。在一年半囚禁期仅有四份外调来的所谓“揭发”材料，即1968年12月25日叶铭汉所写，1968年12月29日何成钧所写，1969年1月18日赵访熊所写三种，以及毕正宣于1969年9月3日、5日、12日及10月6日和12日所写。这四份材料中仅毕的“揭发”写出一大批CC特务的名字，均为教授，其中有叶企孙。值得指出的是毕本人不是教授而是与被揭发的教授很少来往的行政职员。海淀区革委会于1970年3月23日宣布毕正宣为历史反革命，不戴帽，不监督，以表示坦白从宽。

中央专案组把叶企孙交回时，毛泽东已派他亲信的迟群、谢静宜率8341部队和工宣队进驻北大一年多，紧紧掌握领导权，被树为忠实贯彻毛泽东指示落实政策的典范，却不肯收留叶企孙，以致人们常看见海淀中关村街头有位行将就木的老人踽踽独行，或迎着北风仰天孤坐，穿着一条露出碎棉絮的破棉裤和一件捉襟见肘的旧棉袄，腰间扎根稻草绳，脚上趿拉着一双钻出脚指的老棉鞋，花白胡子及头发上结了冰，这就是培养出一大批“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两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一代宗师叶企孙！北大人看不下去，就把他暂时安排到校园外一间学生宿舍，继续隔离审查和批斗。工资早已停发，每月发给50元生活费。1969年12月中，老清华物理系20年代的实验员贾连亨去北大探望叶企孙，回忆说：“看到叶先生挨斗，我哭了。”（钱伟长、虞昊1995，页74）

吴有训闻知后，不顾自身处境的险恶，偕夫人专门去海淀街上伫候。终于有一天遇上了，吴紧紧握着老友的手，偷偷抹去眼泪，塞钱给他，表示要设法营救。（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筹委会1997，页173）

杨训仁刚被“解放”就迫不及待去探望老师，据载他“冒险去北大看望”，目睹“小小的单人床上堆满了书籍，先生坐在一张旧藤椅上，双脚浮肿，不得不搁在凳子上，我问他晚上怎么睡，他说就这么躺在藤椅上。”（钱伟长、虞昊1995，页175）原来叶企孙从监牢中出来已是一身重病，上身骨瘦如柴，两腿粗肿僵直，小便失禁，经常尿湿裤子和床，只好日夜坐在藤椅上，脚下垫着小凳子。1971年又一次被发配去十三陵水库劳改，一年之后被十三陵水库当局送回北大。

张之翔从江西鲤鱼洲劳动两年返回北大后，向工宣队请示获准后去一公寓探望叶企孙，他回忆说：“多年不见，乍见之下竟认不出我来了。他的气色比过去差多了。他告诉我，他的腿走路很困难，是被红卫兵打的。他拉起裤脚管给我看，他的小腿仍然肿着。”（钱伟长、虞昊1995，页203）

李宪之曾对笔者说：“那年代北大老同事心中很惦念叶先生，迫于那种专政形势，谁敢去呀，可是偏偏有人不怕专政，硬是闯进去探望他老人家，太不容易啦，令人钦佩！”李老已想不起20多年前的详细情况。笔者则看到有一位，名叫林其闵，海南人，30年代中叶肄业于老清华物理系，曾在叶企孙指导下译过普朗克和索末菲的著作。在叶企孙出狱不久被工宣队监禁期间，他专程到北大探望。守卫者不让进，他坚持非进不可，看守问：“你知道叶企孙是什么人？”他说：“我不管他是什么人，我只知道他是我的老师，我来就一定要看到他！”（刘克选、周明东2000，页227）

1972年5月，北大宣布对叶企孙的CC特务问题查无实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示宽大。6月又决定恢复他教授待遇，搬入教师公寓，但实际上仍没得到真正的自由。专案组的周岳明通知叶企孙上述决定后，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立即提出请吴有训、周培源两人去见一次面。原来是叶企孙自感时日不多，迫切希望恢复科学史研究工作，想征求两位老友的意见。不久，王淦昌从四川九院出差来京，与龚祖同一道探望老师，叶企孙面对这两位最亲密的弟子竟丝毫不露内心的苦痛，只与他俩笑谈科学史，面对桌上的李约瑟著作，指出其中的若干错误。（王淦昌致虞昊信，虞昊、黄延复2000，页584）

上述情况与另一件事有联系。钱三强有一次在海淀买东西遇到叶企孙，赶忙走过去跟老师说话，他却轻轻地对钱三强说：“以后你再碰上我，不要跟我说话了，省得连累你。”说完就马上离开了。

这一年7月7日任之恭率美籍中国学者访华代表团抵京，受到周恩来总理隆重接待，团员大都是叶企孙弟子。代表团总干事戴振铎说：“我几次要求拜谒叶先生，未获要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等人也是如此，没得到探望叶企孙的机会。

1973年叶企孙所患前列腺肥大症更加严重，肾脏随时可能坏死。侄孙叶建荣以一个医学工作者的身份劝叔祖父动手术，叶铭汉也多次劝叔父住院治疗，但叶企孙坚决不同意，说：“你们以为我还能再活五年呵！”叶建荣在1975年夏对他谈到历史上曾有过不少长寿的名人，叶企孙说：“其实，人无须活得太老，活得太老，最后几年就像熊冬眠一样，什么事也做不成，如果主政，还可能做错事。我一生想做的事，已经做完毕，还有的事，只好留待你铭汉叔父去做了。”有一回，叶铭汉提出要为叔父冤案鸣不平，叶企孙摇摇头说：“那很不容易，历史上有许多人物，他们逝世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结论，不仅是诗人、政治家、文学家，外国有许多科学家，在世时也很不得意，还受教会迫害。”

1974年夏，郭会邦受在美国定居的大哥之嘱，从南京专程到北大探望叶企孙，在校园里向一年轻人询问，此人回说叶是国家罪人，不答而去，最后幸逢一儿童，天真地说常见一老人在院里散步，带他去该老人住所。郭回忆说：“叶先生独卧床上，面容憔悴，衣履陈旧，室内空荡……发音迟钝，断断续续，身体虚弱，但精神尚佳，头脑清楚。……提及周培源建议叶先生既是有罪，应送交公安局看管，从此关了年余，他理解实质上是保护了他，免在外批斗时遭受皮肉之苦。”（钱伟长、虞昊1995，页66）

在此期间极少有人敢写信给叶企孙，这里选摘二封，可见其弟子爱师之心及在精神上给予的支持作用。第一封是戴振铎1972年来访受阻，临回美国前留下的短笺，几经辗转才到达老师之手的：

企师：听说您身体不好，很挂念。

我回国参观、探亲，对祖国各方面的进步无限钦佩，因为团体行动，一切节目均有安排，没有机会来探访您，心中非常不安，只能在临走之前，写此信向吾师致敬并祝健康！！

振铎敬上

七月十六日

第二封是老清华物理系2级冯秉铨写的：

企孙师：

1951年在北大一面，20年来未通音信，这不是说您的学生忘记了您，相反，他们是常常惦记着您的。数十年来，每逢我见到了清华的旧同学，可以说没有一次我们不想到您，谈

到您。……上星期见到了竹溪，他来广州开会，我们谈了一个晚上，通过他我才了解到前几年以及最近有关您的情况，我想再不写信就太不应该了。……想等到1968年再写，因为那是您七十寿辰的那一年。事情竟是如此不巧，1968年正是我处境和您相同的一年，所以又未能如愿。这次竹溪来，引起我下了决心，这次一定把这封信写完。

……在中国物理学界里您的贡献已经写入了历史，这是任何人所否认不了的，更是您的学生们不会忘记的。听说毛主席对杨振宁评价颇高。杨振宁的早期是受过竹溪他们的影响的，而竹溪他们无疑是受您的影响的。现在，您年事已高，回顾这几十年来，没有白费心血，是可以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的……

……

生 秉铨

1974年12月28日

叶企孙收读此信时，不禁叹息说：“秉铨啊秉铨，你哪来这么大的勇气！”

1975年夏叶企孙被宣布解除隔离，次年春节陈岱孙、吴有训、钱临照、王竹溪和钱伟长等特去贺年。这期间因熊大缜冤案而被关押专政的林风已获自由，多次去北大欲探望叶企孙，却打听不到住址，抱憾而回。

钱临照常探望叶企孙，所谈多涉及物理学和科学史以及中国古代诗词，不涉及受迫害屈辱之事。仅有一次，叶企孙取出《宋书》，要钱临照看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1977年1月12日陈岱孙与叶铭汉去探望，发现叶企孙已陷入昏迷状态，急送北医三院急诊，却不准住院，不得已托熟人走后门才得住院。但为时已晚，叶企孙于次日21时30分去世，全国报刊对此均未发消息。

1月1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草草举办了一个小规模追悼会，北大一位领导口头通知叶铭汉：“叶企孙的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骨灰放在八宝山。”追悼会不足200人，主持人周培源不是以北大副校长身份，而是以死者生前好友的名义，由北大物理系党总支书记平秉权致悼词，悼词未经过家属过目和同意，对亡者解放前的五十年和冤案只字未提，只说：“解放后，叶企孙先生拥护党……注意思想改造……”。评价太不公平，死者无谓，生者寒心，参加追悼会者当时就议论纷纷，愤慨不满，吴有训中途拂袖而去表示抗议。周培源在追悼会结束后拉着向遗体告别的林风问道：“叶先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困惑中流露出万般无奈的感情。（钱伟长、虞昊1995，页86）

二、叶企孙冤案艰难的昭雪过程

1977年3月28日叶铭汉写信给中共中央统战部，请求中央过问叶企孙冤案，彰明公理。

1978年1月25和5月2日叶铭汉致信北大党委书记，申明叶企孙亲属们昭雪冤案的要求。7月8日北大党委派人到中央军委查询，被告知军委二办已撤，此事成了无头案，无法处理。7月17日北大党委发函请北京市教育工作部转呈中央军委，尽快将逮捕和释放叶企孙的问题做出一个书面结论，未见答复。

11月20日叶铭汉致函他所在的单位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翌日又致函国务院副总理姚

依林。12月1日方毅将叶铭汉的信转给教育部长蒋南翔，嘱其研究处理。12月13日蒋把信转批给北大党委，同时姚也把信批示给北大。

1978年12月25日叶铭汉再次致函中共中央统战部，未见答复。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开始大规模平反冤案工作。1979年9月14日北大党委为马寅初彻底平反。

1980年5月北大党委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吕正操的平反决定通知书后，于6月作出结论：“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逮捕叶企孙是错误的，强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措施，仅是一句空话而已。例如叶企孙逝世后不久，王竹溪、胡宁等写了纪念老师的文章，报社不予发表，只是到1982年中国物理学会隆重纪念学会成立50周年，由于叶企孙是学会主要创建人，《物理》杂志11卷8期才发表了钱临照、王竹溪、钱三强和胡宁所写的怀念叶企孙的文章。王、钱、胡三文均不得不回避冤案，唯独钱临照大胆披露叶企孙受批斗逮捕的惨状，公然表示愤慨不平。

钱伟长为洗雪老师不白之冤奔走最积极。1978年1月在人大会堂举行的蔡元培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钱伟长收到高平权编的《蔡元培年谱》，查到1938年11月17、18两天的蔡元培日记中谈到叶企孙为冀中抗日筹款及介绍叶企孙见宋庆龄筹款之事。（钱伟长、虞昊1995年，页38）为进一步查实情况，他写信给宋庆龄的助手、好友廖梦醒（刘家泉1988，页411，520，523），请她查明在港期间，宋是否曾见过叶企孙的信，是否谈过支援冀中区的问题。廖回信并转来宋副主席办公室正式公函，证明此事属实。钱得到这些材料后即与何成钧、钱俊瑞、钱临照等商量，由钱伟长执笔写了一份详细说明，与廖梦醒寄来的材料一起交中共中央有关部门。1982年3月钱伟长在民盟中央召开的学习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上，披露了叶企孙遭迫害及身后继续被冷遇的情况。会后钱又向民盟负责人张毕来详细介绍叶企孙的情况。民盟中央办公厅为此专门发了141号文件，致函中共中央统战部一局，恳请将张毕来所整理的钱伟长关于叶企孙问题的谈话批转北京市委统战部研究处理。钱伟长的谈话长达六千字，就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说是有相当大说服力的，例如他列举的叶企孙众多弟子姓名，几乎都是在科学界和政治界有重大声望和影响的人士，特别是许多人在美国和台湾均有相当地位，如担任过台湾经济部长的张光世，科技部门主管徐贤修、张明哲等。他写道：“如果能对叶企孙在这方面的功绩有所承认，这对当前的统战工作和对台对美工作都是有很大益处的”；“在解放前夕，曾有人以熊大缜的事情，劝叶先生不要留下来，但叶先生没有被劝动，仍和大多数教授一起留下来迎接解放”；“在台湾和海外，有人为叶先生留来说他‘傻’，对于叶先生的问题，在美籍华人学者中询问的比较多。赵元任回来，也问叶先生的情况，赵先生同叶先生是老同事。我们如果有所表示，如有负责同志说句话，有人写篇纪念文章，对于统战工作，肯定是有好处的。”

北京市委统战部收到中央统战部一局发出的147号文件《研究处理叶企孙教授的落实政策问题》及钱伟长谈话材料后，又一并批转北京大学。北大党委于1982年5月10日发公函致北京市委统战部并转中央统战部一局，说1980年6月26日已为叶的历史问题做了彻底平反。这样公函来往上上下下转圈子，对大幅标语“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和中央军委办公厅以此罪名公开逮捕他入狱之事没有任何结论，这种状况与全国大规模平反冤案的形势差距太大了！

叶企孙的亲友们当然不能听之任之，继续向有关各方呼吁。1983年3月14日公安部副部长凌云通过二局向北京市公安局作指示：“物理学权威，原北京大学教授叶企孙，据说把他搞成了中统特务，实情如何，详细查一下。”当天下午北京公安局14处派人到北大物理系

处查阅有关档案材料，写了一份《关于著名物理学家，原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叶企孙的情况调查报告》。内中指出：1980年5月北大党委虽然对叶企孙有过一次平反昭雪的结论，但对1972年的结论即所谓1938年叶企孙参与策反八路军吕正操部的历史问题却没有表态，对中统问题也没有一个明确说法，“综上所述，叶企孙从1924年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物理学界元老之一，学识渊博，造诣很深。叶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执教五十年，为我国物理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人才。钱三强、钱学森、于光远、杨振宁、李政道等知名专家、学者，都是他的学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解放后，荣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文革’期间，受到诬陷迫害，含冤死去。这样一起有代表性的案件，至今尚没有很好的落实政策。”

凌云阅后于1983年3月19日写信给邓力群，称：“最近，我见凌其翰等几位国际法专家，他们向我提出已故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科院原学部常务委员叶企孙的落实政策问题。他们说，叶是国内外知名的物理学家，影响很大，而他决不是特务。事后，我经过北京市公安局得到一份关于叶情况的材料，看出叶是在‘文革’中因吕正操冤案受牵连的，北京大学已做过一些平反善后工作，但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现将材料送上，请审阅。可否批给有关部门予以处理。”

这里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办事风格：凌云及其公安部下层，仅在五天之内就完成了从下达指示到调查到完成报告的过程，并对冤案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与教育部门从部长到学校党委几年来令申诉材料转圈子，说空话不办事实的风格形成鲜明对照。

至此，叶企孙冤案的最终解决还缠着一个“死结”，那就是已拖了40多年的“熊大缜冤案”。1939年初，叶企孙在清华的得意门生、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熊大缜受到聂荣臻司令的约见并得到夸奖后不久，却被一支锄奸队秘密逮捕处死，罪名是国民党特务。1948年底清华园刚解放时，叶企孙流着泪对军代表说，他的弟子熊大缜冤死之案务请党组织复查澄清，表明他对共产党的信赖和期望。

但是清华的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却对叶企孙的某弟子说：“中央一位重要领导人认为共产党的这件案子绝对不会错，这表明叶企孙与党有距离。”与此相反，吕正操将军写的《冀中回忆录》，1984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公开出版，内中把熊大缜列为对冀中抗日作出重要贡献的爱国知识分子之一。他在书中特别醒目地列出一节，题为“知识分子的作用”，详细介绍平津两地奔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许多人都是叶企孙荐引去的。

1983年1月9日，天津大学化学系教授孙鲁写信给吕正操，称“1938年初，我受张珍（原名张学渊）同志的委托，经过黄浩联系，介绍了许多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的爱国人士去冀中军区参加抗日工作。这些人对抗日工作有不同的贡献，有的迄今仍负责领导工作。只有其中的熊大缜（即熊大正）在1939年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长期间，不知因为什么问题被处决。……熊的亲友多次向我质问，我也无法回答。我本人也因此受到牵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平反昭雪了大量冤假错案。我们党外人也无限感动钦佩。同时也想到熊大缜的问题，希望也能实事求是地弄清楚，并做出明确地结论。”

1984年3月5日王林写信给孙鲁，称：“今天又找到吕正操同志，吕说去冬在上海找到熊大缜的胞兄弟（刘克选、周明东2000，页241）……他写了书面材料，与你写的完全一致。……吕叫我给你写信，请你把熊的情况……写一书面材料，以便请河北省委（不必再找中纪委）平反。”4月12日孙鲁写了书面材料给河北省委。

1984年7月11日吕正操写信给中共河北省委：“1938年何时逮捕李晓初、熊大缜

（已被处决）和张珍同志，我都不知道。受李、熊两案牵连数以百计的同志除了极少数（如游击军政治部候军同志等）被杀外，绝大多数同志均已宣布无辜回冀中。孙志远同志（冀中区政治部主任）也曾多次向我表示‘内心负疚’。我作为战火中幸存者，为了对党负责，有责任对他们死者生者的冤案向党申诉，为他们彻底平反。”中共河北省委组织力量克服很大阻力，对熊案展开重新调查取证工作，得到了汪德熙、孙鲁、李楚离、姚依林、朱其文、张珍、张方、李广信、林风、祝志超、叶少青、刘维、李雪、顾宗直等许多当事人的证言，无不证明当时的熊大缜确定是满腔爱国热忱的抗日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所谓CC特务完全是秘密逮捕后严刑逼供下的莫须有的罪名。

1985年5月6日张珍写信给孙鲁：“熊大缜一案吕正操司令员和我们都很关心，据我所知，河北省委对这一冤案很重视……”

1986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指出：“熊大缜同志是1938年4月经我党之关系人叶企荪、孙鲁同志介绍……对冀中之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定熊大缜同志为国民党CC特务而处决，是无证据的，纯属冤案”；并特别指出“叶企荪系无党派人士，爱国的进步学者，抗战期间对冀中抗战做出过贡献。……叶企荪根本不是CC特务。”

北大党委接到上述文件后印发了〔86〕224号文件为叶企孙彻底平反，并于1986年12月24日给《人民日报》去函，要求在叶企孙逝世10周年到来之际，公开发表该校沈克琦、孙佑和汪永铨三人合写的纪念文章，“我们觉得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纪念叶的文章，给他的一生以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价，澄清过去对他的诬陷，对于团结国内外专家学者，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党的威信，都是必要的。如果在逝世十周年之际仍无表示，可能会引起更大的不满情绪。为此我们希望你们能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在明年1月13日以前刊登这篇文章。”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该文，题目是《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

三、彻底恢复叶企孙名誉的曲折经过

《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反响并不太多，主要是三位作者均无显要身份。到了80年代末，不但大批在海内外的友人、弟子仍不清楚叶企孙的冤案是否彻底了结，连他的母校清华大学里的师生也多不清楚这段辛酸的历史和叶企孙的贡献。更有甚者，彻底恢复叶企孙名誉的努力一直遭到一些极左派人士的抵制和非难。

90年代初有个中年党员教师，听到一些清华物理系老校友筹划为叶企孙老师立铜像之事，竟然肆无忌惮地扬言：“要知道现在的学校是党在领导，想把叶企孙立像与南翔校长并起并坐，没门。你们要立像，我就敢尿它！”

还有一名原先在党委宣传部门工作，文革后转到物理教研组的教师，1992年从笔者手中得到有关叶企孙的历史材料后，感到很受教育，就向国家教委写了一份建议，把叶企孙的事迹作为教育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内容。不久他慌慌张张地对笔者说：“国家教委领导人（原清华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提醒我说，不要对叶企孙的事太积极，说不定他的案子还会翻过来！”这名领导人所指的就是天津租界里的“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这件事，若证明它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叶企孙和熊大缜就永不得翻身了！也就是这个领导人从1949年起就认定熊大缜被处死是罪有应得，叶企孙为他喊冤就是跟党走有距离。

一些资深人士对此状况表示了不满。对叶企孙的贡献最有发言权的当数吴有训了，他曾长

期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以后又任中央大学校长和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早在1929年科学社15周年纪念大会上他就说过：“中国现在物理实验室可以讲述者唯中央大学、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而已，然此三校则以清华为第一，此非特吹，乃系事实。盖叶先生素来不好宣传，但求实际。”此时吴有训从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的位置上调来清华大学物理系刚半年有余，对叶企孙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评定是十分客观的。1957年夏吴有训已任中科院副院长，有一次他对席泽宗说：“我们不仅应该向叶先生学习他那渊博的知识，还应该学习他的人品。他与清华有着血肉联系，每当重要关头，他都挺身而出，清华能办成一流大学，人才辈出，叶老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从不居功，往往是功成身退。”（钱伟长、虞昊1995，页185）

1997年，清华大学名誉副校长张维参加赵九章诞生90周年暨铜像揭幕大会后，在返回途中感慨万分地对笔者说：“将才易遇，帅才难觅。叶企孙却在清华培养出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等一大批帅才，可是今天清华师生却很少听到叶企孙这个名字。”

笔者从1990年12月起与清华物理系老校友筹设叶企孙奖，就考虑到为老师恢复名誉将遇到的种种阻力，关键是叶企孙在1938年进行的秘密抗日活动不为公众所知。1991年12月22日笔者找到林风，他说：“1938年夏我在天津跟叶先生制TNT炸药送往冀中，事先征求过姚克广的意见，问他知不知道叶先生秘密的抗日活动？我是参加八路军呢还是留在天津协助叶先生？姚劝我跟叶先生干，说：‘叶先生的主意就是我们的主意。’我清楚了，就跟叶先生干。”姚克广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原为清华化学系学生，林风是化学系研究生。姚没有毕业就成为共产党的专职干部，参与领导过1938年的冀东武装起义，次年进入冀中抗日根据地，易名为姚依林，1989年到1992年期间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政治局常委。

1992年1月8日，被叶企孙荐引到冀中后来牺牲的阎裕昌烈士的长子阎魁元把张瑞清陪到我家，张是二、三十年代清华理学院实验员，在1938年是叶企孙的秘密交通员。为留下凭证，笔者特意通知清华大学校史室主任徐心坦，带着录音机来我家一起听张瑞清的回忆。（钱伟长、虞昊1995，页75—78）张瑞清说：“（我）在清华当练习生，与熊大缜一起踢足球而认识。熊找我去冀中抗日，我是独生子，家有老母需照顾，就在冀中与平津间来回跑。叶先生交我任务，完成后就向他报告，不对任何人谈。”他曾带领当年在燕京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的葛庭燧，穿过保定郊外的日寇封锁线去冀中会见吕正操和孙志远等，经常与阎裕昌一起向葛布置抗日任务。熊大缜被处死后，他被迫中止这项抗日活动，一直信守叶企孙的嘱托，绝不对任何人说出这一抗日情况，原因正如陈岱孙纪念叶企孙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要保护这批当年跟随叶企孙进行秘密抗日活动的好人们。（钱伟长、虞昊1995，页1—5）张瑞清这次到笔者家来，是53个年头以来第一次透露真情，也正因为守口如瓶，才幸免了三次大灾。相反的典型是林风，日寇抓住了他并将之关入大牢，因为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才没被处决，坐牢几年直到日寇投降。清华从昆明复员回北平后，叶企孙要他到清华任教，但国民党特务却盯上了他，因为他参加过共产党的抗日活动，弄得他只好匆匆逃到南方去躲藏，解放后又因冀中抗日之历史，在文革中受到专政迫害，三个不同的时代均为此付出坐大狱的代价。

1992年4月26日中午，笔者介绍张瑞清和阎裕昌的三个儿子与葛庭燧会面。分手53年后的重逢使葛庭燧激动不已，也由此解开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困惑。原来当年指派给他的秘密抗日任务并安排他去冀中的幕后指挥就是他敬爱的老师叶企孙。当天下午举行的首届“叶企孙奖”发奖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葛庭燧向大家介绍了张瑞清和阎裕昌烈士的三个儿子。回忆起当年他在燕京大学按照叶企孙指示进行的抗日活动，会场群情激奋。

钱伟长担任会议主持，与会者还有叶企孙的好友钱临照和入门弟子赵忠尧、傅承义、彭桓武、王大珩、马大猷、秦馨菱等资深院士，以及跟随叶企孙在平津进行抗日活动的弟子林风和

祝懿德。钱伟长当年因在平津协助叶企孙作过一些抗日工作，常见到林、祝二位同学，当钱伟长向大家介绍他们二位并激动地诉说叶师的抗日贡献和清白之冤时，会场都非常激动。当时担任清华校长的是毕业于60年代的张孝文，受到感染站起来即兴发言，高度赞扬叶企孙这位老清华领导人的科学贡献、爱国精神和高尚品德，号召师生们要学习和继承他的事业和思想品德，并支持校友们出版纪念集的倡议。这可以说是院系调整之后40年来，清华大学里的首要领导第一次公开地正确地评价叶企孙。笔者组织了两部录像机作了实况录像，记下了这些证人证言（4）。

但是，阻力仍然层出不穷，笔者觉得有义务披露出来供后人深思。中共河北省委的平反决定是1986年8月20日作出的，然而直接受此冤案牵累的熊大缜亲友并没有及时获得这个决定，其后还被告知不要在公众中扩散。如在熊大缜领导下任处长的祝懿德，直到11月才见到这个决定。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据孙鲁告诉笔者，当年参加处死熊大缜的一名锄奸队员现已升为河北省委的重要领导，他就坚决反对这个决定。幸亏不久后他死了。刘克选在写作关于叶企孙的硕士论文过程中，曾到河北省委作调查，遇到过这个干部，他临死前还坚持认为处死熊大缜是无可非议的革命行动。

1992年春清华校史室一位干部曾好心劝告笔者，说他们听到林风的回忆后，曾去访问姚依林，姚说已记不清与林风谈话的情况，所以劝笔者不要再把这件事追查到底，就此止步。笔者为编写《一代师表叶企孙》一书，再度访问林风并转告了上述情况，希望他能写出一篇回忆文章，这就是他那篇极为翔实的《深切怀念叶企孙先生（忆抗日）》。由于纪念集需等候其他作者来稿后统一编辑，这篇文章就和陈岱孙、任之恭、葛庭燧等人已写好的纪念文章一道，先期在1993年8月发行的《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二辑中全文刊出。这些文章特别是林风提供的不为人知的抗日珍贵史料，引起广大海内外校友的震动。

1992年清华校庆聚会时，众多校友搞了一封联名信，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校庆之后，笔者持此信继续征集签名支持，最后连远在外地和海外的名人如杨振宁、吴健雄、任之恭、林家翘、戴振铎等都签了名，连同陈岱孙、赵忠尧、钱临照、孟昭英、王淦昌、傅承义等共127人，平均年龄高达72岁。张孝文校长闻知后通知笔者说，不用再征集签名了，快把此信交给他，以便校党政领导尽快讨论通过。可是这封呼吁信却被清华的党政领导会议否定了！

1993年清华校庆日，为进一步宣传叶企孙，特在科学馆一楼会议室举办叶企孙生平照片及手迹展，参观者无不震惊和钦佩。

这一天下午情况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当天在新建成的图书馆会议大厅举行“叶企孙奖”第2届颁奖大会，同时举行叶企孙诞生95周年纪念大会。老清华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和农学院院长汤佩松这二位九旬老人来了，此外还有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王大珩、何泽慧等著名院士20多位。钱伟长主持大会时宣读了国务院新任第一副总理对纪念大会的致贺电，使会场大为震动。这位国家领导人的毕业证书就是叶企孙签的名，他是叶企孙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时的学生（当时清华不设校长）。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这个大会的实况，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在清华大学干部和师生中更引起震惊。

于是清华大学党委作出了积极反应，决定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4月25日，在清华大学三教楼前广场，隆重举行叶企孙铜像揭幕暨《一代师表叶企孙》首发仪式，由清华大学党委主持，中科院院长周光召、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北大和中国物理学会的领导人均出席盛会，10多家重要新闻媒体到会采访。叶企孙好友老清华工学院院长施嘉炆、年近九旬的大弟子王淦昌和叶铭汉三人共同为铜像揭幕。李政道闻讯后已来不及赶来参加，特发来手书电传：

怀念叶企孙老师

万世师表

生 李政道

一九九五年四月

北大物理系主任赵凯华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在会上的发言中的一句话“郁积心中18年的块垒今日始消”，可以说是反映了所有参加大会的人的心情。

历史是否到此画上了句号了呢？

四、余音

这一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央电视台在一年以前要拍一部电视片作为献礼，在人们心目中为抗日作出辉煌业绩的大都是国民党部队的将领，这从北京市的街道命名就可以看出来。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和林彪率领的平型关战役也可以数得上，但彭德怀为百团大战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林彪则落得个折戟沉沙的下场，电视剧编导们只好把目光投注到一位国民党将军身上。笔者写信建议拍片介绍叶企孙及其弟子们以科技支援敌后抗日的事迹，因为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抗日是世界公认的一个战争奇迹，使日本鬼子胆战心惊的主要武器则是高技术地雷，这个事实足证恩格斯“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的论断，以及邓小平关于科教兴国人才是关键的道理。《地雷战》一片大受群众欢迎，就是因为抗日战争中的共产党依靠爱国知识分子，运用科技手段打击敌人，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日本侵略者的威风。影片主题是正确的，可惜“左”的禁锢使制片人回避事实，把地雷技术的运用全部说成是当地农民的创造，抗战中没有科技知识分子的功劳。现在应该把颠倒的东西纠正过来，恢复历史原貌，特别应该反映熊大缜的贡献。笔者的信得到中央各级领导的批示，也获得电视界的赞同，于是他们访问了张珍、张方等人，按照熊大缜、张方〔5〕和阎裕昌等人为原型编拍成故事片《又是满山红叶》〔6〕，在清华举行叶企孙铜像揭幕时首映。放映后举行了座谈会，与会大学生反响非常强烈，为清华大学出了这样一批爱国师生而感到无比自豪。至此笔者想起叶企孙对大一学生王淦昌讲过的一句话：“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这也是被冀中抗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真理。

但是现实情况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原先在故事片结束部分要映出一个实况录像，是在广电部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由张珍、张方、汪德熙和王之任等当年参加冀中抗日的知识分子回忆，述说当年以科技知识为抗日作贡献的事实，可是公映时这个最为重要的部分被砍掉了，这部片子放映没有多久也就停映了。几乎是同一时期，《物理》杂志要发表笔者的一篇《忆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叶企孙》，编辑部要求笔者将文中叶企孙以“科学救国”思想教育王淦昌的内容改一下，他说“科学救国”这四个字曾遭到严厉批判。笔者认为既要忠实于历史，就不可改。何况笔者过去的文章中已多次宣传这一思想。孰知编辑说道，谁能预料政治运动的动向呢，万一翻过来我们可要承担责任了！

1996年后，情况有了好转。广电部投入很大力量筹拍大型专题片《科教兴国》，专门有一集以冀中抗日的历史阐明科技对战争的重要作用，以说明科技强军这个战略思想。吕正操、汪德熙、张方和笔者四人详细介绍了叶企孙以科学知识支援冀中抗日的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其后几集则介绍了叶企孙的众多弟子们，在国防现代化和“两弹一星”领域的巨大贡献，令人信服地说明科教兴国战略的正确和重要，从而也表明了叶企孙一生业绩的辉煌。

谨以此文纪念叶企孙先生110周年诞辰。

参考文献：

胡升华 1988。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中国科技史料》(3): 27—34。
刘克选、胡升华 1989。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自然辩证法通讯》(3): 64—76。
刘克选、周明东 2000。《叶企孙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刘家泉 1988。《宋庆龄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钱伟长、虞昊 1995。《一代师表叶企孙》。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 1997。《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叶企孙 1917。中国算学史略。《清华学报》2(6): 49—64。
虞昊，黄延复 2000。《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注释：

- (1) 虞昊，清华大学物理系退休教授。
- (2) 涉及叶企孙及其弟子熊大缜参与冀中抗日并受到迫害的文字过去是没有的，1988年后胡升华和刘克选分别在钱临照、范岱年指导下发表了多篇文章〔胡升华，1988；刘克选、胡升华，1989〕。他们所依据的最重要史料，就是北大物理系保管的叶企孙在文革中写下的自传体的“书面交代”材料。由于档案的特殊性，当时不许复印、拍照。刘克选告诉作者，他是靠偷偷朗读并使用隐藏的录音机，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的。
- (3) 有关熊大缜冤案的始末，参阅上述胡升华、刘克选等文。
- (4) “叶企孙奖颁发大会”，1992年4月26日实况录像，现存清华档案馆。
- (5) 原名李度，当年是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为共产党的抗日作出很大贡献，因制取炸药右手被炸成残废。著有《敌后军工生活回忆》一书，由晋察冀根据地军工史编辑部印刷后内部发行。
- (6) 中央电视台摄制，导演王静，策划虞昊。

~~~~~

## 【史海钩沉】

### 文革中的华罗庚“剽窃陈景润”事件

• 王 元 •

据武衡回忆：“在1973年4月6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简报》第7期上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概括地介绍了陈景润的工作。新华社据以发表了一条消息，认为是‘一项被认为在国际上是领先的新成就’，‘是20世纪数学的最大成就之一’。中央领导同志看到了这份《简报》后，要求科学院‘写一较为详细的摘要’。4月16日数学所将稿子送我审阅签发，于20日报送中央。”

“在这期间，新华社又发了一条陈景润患严重的腹膜结核，病情危险，急需抢救的消息。江青看到了批示‘要抢救’，并送给毛泽东审阅，毛画了一个圈，退姚文元办。一天半夜，已是12时多了，迟群打电话给我，说是陈景润病危，毛主席批了应立即抢救。可是，我前两天还见到他，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严重，但也很难说，天有不测风云么，而且是毛主席亲自批的，怎能延误。我当即乘车到中关村陈景润的宿舍看望。大约两点多钟，我打开陈的房门，看到他正在稿纸上书写进行数学研究呢。陈不知我的来意，连忙表示是在听英语新闻广播，表示他关

心政治，并非搞数学研究。他之所以如此惊恐，是因为‘文革’中对他‘不问政治’的错误进行过严厉的批判，他曾表示今后不再搞业务了。他以为我是半夜来检查的。当我说明来意后，请他随我去清华大学为他检查病情，他才释然。我们到清华大学时已是黎明，迟群和协和医院的结核病专家张孝骞教授已在那里等着了。张教授为他详细检查后，认为有结核病，但并不像所反映的那样严重，建议住疗养院休养一段时间，这样可能好转。接着就决定立即送疗养院治疗。陈景润本来不想住院，但是组织决定，而且是毛主席、江青的指示，陈就激动地连声感谢毛主席和组织上的关怀，当即由该所负责人把他匆匆送进附近的疗养院了。”

在陈景润住院前，迟群单独去陈景润在中关村 88 楼的住处找过陈景润。这件事哄动了数学所。陈景润的住房是一间 6 平米的房子，原来设计做锅炉房的，但从未安装过锅炉，于是改作卧室。众所周知，陈景润愿意一个人住一间房的原因是他可以偷偷地搞数学。令人费解的是像迟群这样的大“左”派，怎么会去“拜访”陈景润呢？

据华罗庚的助手回忆：迟群找陈景润的目的是要陈景润站出来“揭发”华罗庚“盗窃陈景润成果的问题”。你别看陈景润装疯卖傻，他可精灵了，第二天他不去找别人，惟独专程去找了陈德泉，据实告诉了陈德泉：“迟群要我揭发所谓华老师盗窃我的成果问题，怎么办？”陈德泉被这突然来的消息吓懵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更摸不清陈景润的意图。于是只好问陈景润：“华老师到底有没有偷你的成果？”陈景润说：“没有。”陈德泉说：“那你就据实说吧，反正实事求是嘛。”陈德泉立即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岳枫。岳枫当机立断地表示：“向华老报告。”华罗庚知道后，立刻明白：迟群的背后有人。这人就是江青。谁都知道，在“文革”中惹怒了江青意味着什么，华罗庚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显得格外镇静。他知道在这种时刻，一句话说错了，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陈德泉来找王元与吴方，了解华罗庚与陈景润的业务往来。陈景润是一个喜欢独自一个人钻研数学问题的人，这是他的脾气。华罗庚并不计较，就让他一个人自己去研究数论好了。所以华罗庚与数论组的人都与陈景润没有什么业务瓜葛。王元与吴方告诉陈德泉：华罗庚与陈景润惟一的业务往来就是塔内问题。

这时，中关村已经流传着所谓华罗庚盗窃陈景润成果事件的风言风语，还传什么有人在中关村暗中调查，写“内参报告”等。最严重的是在数学所全所大会上传达了江青关于陈景润问题的“批示”，其中有一句：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这是大意，因找不到“批示”原件，但“汉奸”二字确有。谁又是“汉奸”呢？空气顿时凝固起来了。

华罗庚将王元与吴方找去谈话，大家将当时的情况作了如实的回忆。当时陈景润就是为了塔内问题的工作而调来数学所的。他的工作已在 1956 年“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上公开宣读，而且报纸上也报道过。华罗庚又如何能“盗窃”众所周知的成果呢？

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是吸收了陈景润的想法，但他已给予了足够的感谢。1957 年，《堆垒素数论》的“再版序”中写道：“作者乘此机会向越民义、王元、吴方、魏道政、陈景润诸同志表示谢意，他们或指出错误或给以帮助，不是他们的协同工作，再版是不会这样快就问世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华罗庚知道他的老学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最小的是吴方。他建议吴方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一个报告，将当时的情况作如实的叙述。当时数学会的秘书长王寿仁也写了报告，说明情况。他们的报告抄送给了几位中央领导，其中包括姚文元。

大概是江青正忙于“批林批孔”，“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顾不上华罗庚了。王寿仁与吴方的报告送上去后，就不了了之了。王寿仁、陈景润与吴方在华罗庚极困难时，做

到了实事求是，向他们的朋友与老师伸出了援手，华罗庚是很感激的。

华罗庚与陈德泉有一次外出，路过陈景润住的医院。陈德泉建议去看望一下陈景润。华罗庚还便于跟陈景润见面，就叫陈德泉一个人去，他自己坐在汽车里等着。陈景润对陈德泉说：“华先生永远是老师，迟群说的完全没有这回事。”

事后，华罗庚几乎从不在家里人、朋友与学生中提起这件事。他对他的总角之交胡柏寿谈过：“四人帮在‘文革’中要陈景润揭发我，诬陷我剽窃了他的科研成果，陈景润不肯，就威胁他说：‘人证物证俱在’，陈景润坚定地说：‘既然你们掌握了人证物证，还要我揭发干什么？’”又据包谦六回忆：“江青先想拉拢他，拉拢不成，就打击他。最恶毒的一招，是想利用陈景润出来讲话，污蔑华老师著作中偷了他的研究成果，可是陈景润不受利用，装痴学呆，保持人格。”

江青对华罗庚及其亲属的迫害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华罗庚的女婿，即华顺的丈夫王敬先，原在中央警卫局工作，“文革”前调到苏州任中共苏州地委副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华顺则久幽囹圄。华罗庚从来不在同事中谈起这一伤心事。仅对胡柏寿等极少数人说过：“王敬先过去和江青在一个支部，他对她的事知道得太多了，所以江青早就要置他于死地。”据说王敬先在延安时曾说过：“江青根本不懂马列，只会喊几句革命口号。”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江青就伙同叶群对王敬先下了毒手。

“1968年8月27日，康生、曹轶欧还指示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60人分别诬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有严重问题’等，占115名常委会委员的52%以上，把74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占159名政协常委会委员的46%以上，连梁思成、童第周、华罗庚、茅以升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也未能幸免。”由于这一庞大的名单未能全面实施打倒，华罗庚总算幸免了。

1972年底，当华罗庚与小分队在辽宁省普及“双法”时，辽宁省有个接待计划。据华罗庚的助手回忆：毛远新在计划上批示：“我以为某国元首又来了。”意思是计划订得太铺张浪费了，但所用语气显然是不友好的。小分队在沈阳搞了一个“双法”成果展览。毛远新看过了预展。在毛远新会见华罗庚等时，出于某种原因，他肯定了“双法”普及所取得的一定成绩后，接着就说：“世界上不存在最优，最优这一提法不科学，不符合马列主义，最多只能称为较优。”略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数学上的“最优”都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优”。大学中微积分课就讲到了。但这个时候是不能辩理的，于是只能连夜加班，将展览馆中出现的“最优”字样都改成了“较优”。

据华罗庚的助手回忆：1974年，华罗庚及其小分队在湖南省普及“双法”，华罗庚那时在湘潭。风声突紧，有传说：在讨论人大常务委员名单时，江青建议取消华罗庚的人大常委。岳枫当机立断，立即叫在湘潭的陈德泉与裴定一连夜赶回长沙开会，并且于华罗庚第二天起床前赶回湘潭。他们二人连夜到达了长沙，跟岳枫及少数人商谈了撤销华罗庚人大常委的事并涉及到小分队的命运问题。他们二人又于清晨赶回了湘潭。

华罗庚已经料到大事不好了，据计雷回忆：多年后，华罗庚曾笑着对计雷说：“在湘潭一清早，我看见你们都不在了，我就料到出了大事了。”陈德泉回到湘潭的清晨，华罗庚找他单独谈话，华罗庚有感情地说：“你很累了，如果工作困难了，你怎么办？”陈德泉说：“跟着你干。”华罗庚语调平和，就跟平常聊天一样，从他1950年回国谈起，谈到毛泽东会见他，鼓励他

为国家培养青年数学家，再谈到他的应用数学与“双法”普及工作。华罗庚说：“我们的工作受到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支持的，只要还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搞‘双法’搞下去，除非毛主席说，你们这样搞是错误的，我就立刻停止这件工作。”那时，在北京的计雷的妻子正要生孩子，计雷要回北京去照料。大家托他回北京后找一下王军，并到华罗庚家里看看动静，总算没事。据说是周恩来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保护了华罗庚。他的人大常委职务才得以保持。

1975年，华罗庚与小分队去河北省保定胶卷厂普及过“优选法”后，王洪文、姚文元等也去了一下这个工厂。他们得知华罗庚在胶卷厂普及过“优选法”。他们作了批示。这一批示在数学所全所大会上传达了。王洪文批示的大意是“还是要搞‘双改’的嘛”。姚文元批示的大意是“最优这一提法不科学，按马列主义，优都是相对的”批示原文已找不到了。批示传达后，数学所的人都被弄得莫名其妙。王元立刻去华罗庚家，告诉他数学所传达了这些批示。华罗庚心事重重地、轻轻地说了一句：“知道了。”于是久久地沉默，王元也就告辞了。

江青曾拉拢过华罗庚。据胡柏寿回忆：华罗庚说，在1972年，“一次中央举行文艺晚会，我收到一张入场券，座号是六排二座，这通常是中央首长席，我想里面有文章，灵机一动，马上找熟人换了一张票，坐到别的位置上，刚一坐定，会场里灯光渐渐暗了，随风飘来一股刺鼻的香味，原来是江青，后面簇拥着一群人入场了，恰恰她就坐在六排一座。华罗庚讲到这里微笑着，庆幸自己早作准备，他敲定这次江青是蓄意寻衅想整他的。”又据包谦六回忆：“有一次，分配给华罗庚的观看剧场表演票子是六排当中的好位子，华罗庚坐上后，发现本排当中有几个位子始终空着，在表演将要上场的一刹那，瞥见江青带了几个人上场了，华罗庚即刻机警地与邻座悄悄地换了位子，等到江青一批狗才坐定，左右环顾，不见华罗庚其人。这一场演戏是严重的，在千万人眼睛中，假使接受江青的捧场，人格何在？如果被侮辱，依他的名望只好‘玉碎’了，太不值得。”80年代，华罗庚还将江青对他的迫害告诉过他在美国的老朋友。

对“四人帮”设下的重重陷阱，华罗庚小心翼翼。在家里人、朋友与学生面前只字不提，还要装得若无其事，也许最多只有胡柏寿、包谦六能听到只言片语。对华罗庚这样一个个性倔强的人来说，其痛苦可想而知了。“几经折磨，华的心脏病又发作，住院治疗，等到病情略为好转，天天偷偷地写诗骂‘四人帮’，做了一个小册子，不肯示人（不晓得能否遗留下来）。我处存有他的残稿一纸，是一首没有题目的诗：

关州战役胜利日，白骨妖魔心如炽，‘我要分裂停生产，尔辈竟敢搞团结’。

这首诗是愤怒斥责“四人帮”的。等到陈毅同志逝世开追悼会时，有几位反对“四人帮”的老同志，抬扛陈毅遗体的时候，华先生毅然起立，忘记自己的蹠脚残疾，也扶杖参加抬扛，表示对“四人帮”的抗议，这时，华已怒吼了。”

□ 节选自《华罗庚》

~~~~~

【研究动态】

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 杨银波 •

◇ 王佩英将成为民族记忆

40年前，北京一名普通的勤杂工王佩英被残酷杀害，罪名是“反革命”。这条罪的来由是，

面对无数人高呼“毛主席万岁”，王佩英突然高喊：“同志们，听我讲句话。”人们顿时静了。谁也没想到，她接下来要讲的那句话是：“打倒毛泽东！支持刘少奇！”一时间，众人如黑蚂蚁般涌上，纠打王佩英，遂押走。王佩英经历了精神病院、劳改场、牛棚及众多批斗大会的残酷折磨，最后被卸去下巴，活活勒死，留下七个孩子无人抚养。40年后，《我的母亲王佩英》被拍摄成独立纪录片，500余人聚集北京，为死去的王佩英开了一个庄重的纪念会。郭宇宽写了一本没法上市发行的《王佩英评传》，我也从网上搜集到25篇纪念和追忆王佩英的文章。

此刻的互联网，正如地火般传播着王佩英的英雄事迹。在中国邮政与诸多物流公司的运输工具上，正装载着王佩英影片光碟、纪念会光碟，以及刊载《寻找王佩英》的《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5期）。在我的信箱、QQ和手机里，常有读者和友人要求索取王佩英资料。越来越多的人，正打开DVD播放机或电脑光驱，感受着40年前文革的残暴，也感受着王佩英后人至今挥之不去的震颤。我的能力实在有限得很，顶多写点文章，发在互联网，函告与我有交道的众多媒体编辑及记者友人，告诉他们：“王佩英是惨死于文革的中华烈士，距今就义40年，也被公众遗忘了40年。鲜血不可白流，精神不可忘却。”

我能做的，就是告诉2010年还活着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曾有那样一个伟大的女性，她以她的鲜血，喷溅到国人麻木灵魂的深处，这是一位“千里风雪我独行”的圣女。手中持有的一批王佩英光碟、杂志，在一天之内，就被我送完了。此前，许多人通过互联网，读过我写的《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从我手中拿到光碟、杂志的人，包括复印店主、理发店主、杂货店主、电脑店主、电脑培训师、桌球馆主、诊所医生、退伍军人、小学教师、高级技工、基督徒、炒股者、武术冠军、公司老总、部门主管、公司设计员、小区保安、工伤民工等等。确实，供不应求。在送资料的途中，一群白发老人听说这是反映文革真相的作品，也希望获得一套，无奈只好将我仅存的一套也送了出去。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自稚嫩小苗变作参天巨树，甚至形成树木成荫的局面，这是我的期许，也是王佩英后人（尤其是张大中、张可心）的夙愿。一般人，没有张先生这种气魄。仅以成本而论，且不说拍摄、寻访、制作、纪念会等前期消耗，仅是大批复制DVD和购买杂志，成本也相当高昂。加之，索取王佩英资料是“函索即寄”，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免费索取，索取者没有一分钱的负担。我暂不知拿到王佩英资料者究竟有多少人，也许已逾万人，未来将更多，注定成为民族记忆。

◇ 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张大中是王佩英的第三个儿子，系大中电器集团董事长，拥有门店近60家，年销售额近100亿元，市场占有份额常年稳居北京家电市场之首。他有着如此举足轻重的身份，却“豁出去了”，我个人的理解是，他已忍了整整40年，今天突然站出来，不是想对抗什么，而是要把真相彻底讲出来，毕竟当初他的母亲王佩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不是1980年粗糙的“平反”就能敷衍了事的。王佩英是暴君加暴民政治疯狂迫害的牺牲品，是文革悲剧的典型缩影。她不足55年的短暂人生，是中国当代史、政治史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人，既然有机会了解到这位抗暴者的事迹，就应从心灵深处拒绝文革灾难，反思专制独裁给人民带来的惨痛和损失。

有位网友评价得很朴素：“张大中是个孝子。”也有网友说：“这就是有钱人才敢干的事啊。换成你我，只能装作没发生过那么惨的事。”其实不然。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的人亲身经历过文革，有的人是父辈、祖父辈经历过文革，不管你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这件事终究发生过，是有证据、有痕迹的。但为什么那么多位高权重、富甲一方的人，统统选择了沉默？这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或者“俱往矣”就说得过去的吗？人们看见有个人跌倒在坑里，遂统统统过去。倘若人人都这样做，越来越多的人都会跌倒在那个坑里。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政治迫害、人权灾难的历史，譬如德国遭遇法西斯，当初何等残暴、何等疯狂，此后皆有大量具有反思意义的建筑、文艺以及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措施，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但在中国，且不说1966年以前和1976年之后政治迫害，单说十年文革的大量真相，就没有彻底公开过。上个世纪80年代，民间在寻根，但同时又遭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阻碍。中国有了互联网之后，更大规模的反思运动开始了，但同样遭遇了网络封锁和刑法恐吓。

为了纪念王佩英，大中公司专门开设了《王佩英网站》，网站内有纪念文章和影片资料等内容。但搜索整个互联网，在大陆却找不到视频。传播王佩英事迹，似乎成了某种程度的禁忌，删帖、删视频乃是常态。有的网友，恰如“地下党”般谨慎告之：“嘿，哥们，这里可以下载王佩英影片。”没过几天，那下载地址又消失了。因影片极为清晰，容量很大，有的朋友将影片分为七段，放在电子信箱，内部告之信箱密码，众人纷纷下载。原本如此正大光明的事，在中国却如老鼠过街，偷偷摸摸，神神秘秘，实在讽刺得很。

◇ 必须吸取血的教训

一位感情至深的友人刚刚从辽宁发来手机短信：“王佩英传记读到一半，即泪流满面。多么惨烈的人间，多么肮脏的罪恶时代。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王佩英已经被杀害，而我那惨遭当代文字狱的亲人还活着，在监狱里活着，这是亲人的幸运还是不幸？杨先生，你如何看待？”我回复道：“眼泪，是立起的助力。哭过，便在心中强大起来。这是中国志士顶天立地之前的残酷规则。”这位友人，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当地名望甚高。按说，他已屡次见识过残酷的专制迫害为何物，不是心灵脆弱之辈，但面对王佩英这位40年前英勇就义的女性，他仍止不住嚎淘大哭。

除非铁石心肠和故意回避者，否则无人不为王佩英落泪。这眼泪，如同某股震撼人心的精神穿透发肤，渗进鲜血，进入骨髓，成为人们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在王佩英纪念会上献花、敬礼的那些人一样，那朵花、那个礼，不仅仅是向王佩英致敬，更带着太多的自我唤醒，激励自身。中国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那么多号称“爷们”的男人，在文革中都死哪儿去了？他们为了活命，低下头颅，放下尊严，抛弃真理，有不少人甚至积极配合施暴者，揭发他人的所谓“罪行”，人与人斗，借刀杀人。那时的中国文字，比任何时期都要邪恶和肮脏，凭一个字就可以把你彻底打倒，凭一句话就可以杀一个人。他们忏悔过吗？公开站出来检视过自己吗？

40年过去了，当初的少男少女如今也当爷爷奶奶了。民间残存的记忆越来越稀缺，真实的历史场景比后人模糊的回忆更为残酷，更为窒息。历史被抹去，屠刀上的血已蒸发。多少档案没有解密，多少人拿着抚恤金就此一了百了，仿佛那些人根本没有被殴打、被批斗、被逮捕、被关押、被劳教、被杀害、被株连。难道，十年文革仅仅是中国人做的一个根本无所谓的梦吗？文革固然带来了灾难，但为什么这种被我命名为“专制暴政”的专政，此后仍然没有消失？我承认，邓小平、胡耀邦等一批人为平反做了些实事，但那远远不够，是表面工作，真正的实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民主”。

政府高层对此曾经有过一些“舆论导向”，最知名的就是江泽民的“与时俱进”和“登高望远”。说直白些，就是要人民忘却这种惨痛灾难，抛弃前嫌。对不起，你能忘，我忘不了，很多人都忘不了。不是说希望高层做第二次平反，或者做1976年以后诸多政治迫害的平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主张是，手痛治手、脚痛治脚不是根本办法，杀一批、关一批然后又来道个歉、给点钱，这都没用。掌权者不吸取血的教训，罪恶的历史永远会恶性循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者今后其它什么党，没有记住这个教训，罪行还是照样犯。公民持不同政见，

当局就打压你，甚至把你整死、整疯，身强体壮的一个人，在监狱没几个月就变得骨瘦如柴，还要插呼吸机。怎么解决这种恶性循环？

◇ 摸着胸口的良心说话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们怎么来迫使政府文明起来、民主起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公民，尤其是农民，怎么觉醒起来，强大起来？这是公民社会与民主政府的重大课题。不能为了少数特权者的稳定，而压制社会的正常表达。我不求激进地呼唤多党制，仅求最基本两点，那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起码要争回来。许多事不让做，但起码许多事总可以想、可以说吧？40年前，如果1%的人像王佩英那样站出来，文革不会在中国产生。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1%的人像王佩英那样站出来，国家也没有那么多人权灾难，没有瘫倒在轮椅上的倪玉兰，没有“家成为第二监狱”的郑恩宠，没有作家、学者、记者写稿时的自我审查与担惊受怕。

在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不难找到自由和权利的踪影。问题在于，这是法制而非法治。该用法律来“制人”时它叫法律，但该用法律来“免于被制”时它就是一张普通的纸。人民没有自由和权利的根本保障，尤其是现实社会的制度性保障。你说你懂法，可你在大学法学系读的那些书，就像一部部虚拟的剧本。在权力第一的时代，法律是被强势者拿来玩弄的。王佩英的死，据称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是一个没人相信法律只相信毛泽东的时代。当道德已经倒塌崩溃，最低的道德（即法律）倘若也不被人民信仰，王佩英式的灾难只会接踵而至、层出不穷，而非仅仅停留于她一人的惨剧。

王佩英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她的信念极为简单，谎言就是谎言，灾难就是灾难，罪恶就是罪恶。她之所以如此坚持，不是因为她见过多大世面，受过多高的教育，有多么丰富的信息渠道，而是因为她忠于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是摸着胸口的良心在说话，为什么要撒谎？很多人会说，你撒个慌有多大个事呀？不，你没有她那种对灵魂的忠贞捍卫，这是耶稣、苏格拉底、谭嗣同式的，叫殉道。这种为道而死的勇气，有着看透生死、保全灵魂的坚毅，非常人可以企及。如果中国人个个都贪生怕死、趋炎附势，这个国家是不配被世界敬重的。我们这些后来人，应以历史上曾经有过王佩英这样的人而自豪。如同世界史上有过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我们中国也曾有过林昭、遇罗克、王佩英，以及更多愿意为道而死的大写之人。

如果我的足迹到了北京，我一定会与王佩英的众多后人相见，促膝长谈，思想没有疆界，话语没有高墙。在迎面而来的握手瞬间，我想，我一定会这样说：“道路崎岖，路不好走，但走着走着，路就敞亮多了。很多个你们，很多个我们，很多个他们，其实都在王佩英这条道路上。”

王佩英是惨死于文革的中华烈士，距今就义40年，也被公众遗忘了40年。鲜血不可白流，精神不可忘却。由其子张大中先生当导演，中国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胡敏兄妹拍摄，郭宇宽做文字统筹，完成了意义非凡的独立影片《我的母亲王佩英》。

张大中先生，系北京大中公司董事长，旗下已成立专门的“王佩英资料秘书组”，负责免费赠送王佩英的影片和书籍，欢迎各界索取。借用韩寒说的一句话，“无论你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普通人”，都有绝对资格免费索取《我的母亲王佩英》的DVD影片、“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光碟、《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杂志等资料。这包裹到你处时，你不需要出一分钱。而且，只要你是在这地球上活着的人，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英国、瑞士或者阿拉伯、阿根廷、阿联酋，都有权利免费获得所有王佩英资料。

请索取者向“王佩英资料”信箱提供索取者的四项内容，缺一不可，包括邮编、地址、姓

名、电话。四项内容完备，即马上安排寄出资料，索取者等待收包裹。索取者亦可转载或转告本消息给你所有的朋友。期待众人积极传播“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的王佩英的感人事迹。这件事，是大事，是要生根发芽，并注定成为民族记忆的事。

“王佩英资料”信箱：wangpeiyingbj@gmail.com

关于王佩英的部分公开文章（大部分在网络可查，且《维基百科》、《百度百科》亦有“王佩英”词条）

- 1，张大中：母亲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演讲稿
- 2，茅于軾：在“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感言
- 3，黄方毅：“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演讲稿
- 4，齐克琦：我的牛棚挚友佩英姐
- 5，林克明：对王佩英同志的一些回忆
- 6，王学联：悼念王佩英
- 7，田贵勤：关于和王佩英同志交往的回忆
- 8，高淑琴：回忆大中的母亲
- 9，林朝华：回忆王佩英
- 10，李钟禄：我记忆中的王佩英
- 11，暴天成：追忆往事
- 12，王世伟：清明随想
- 13，徐玲：静宜英魂——王佩英
- 14，默茗：甘赴地狱的圣女——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书籍《王佩英评传》读后感
- 15，方 泉：张大中的母亲（发表于《融资中国》）
- 16，郭宇宽：王佩英评传
- 17，郭宇宽：寻找王佩英（发表于《炎黄春秋》）
- 18，王友琴：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
- 19，吴稼祥：虽亿万人，吾往矣——纪念圣女王佩英诞辰95年周年、赴难40周年
- 20，杨银波：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发表于《纵览中国》）
- 21，赵 锐：胡杰新片——我的母亲王佩英
- 22，晨 海：无论怎样毒打，北京母亲王佩英也不跪下
- 23，司马当：一个曾“被精神病”的女英雄
- 24，曹培植：文革先驱——不为众知的英雄母亲王佩英
- 25，吴一汉：王佩英，一位被遗忘的英雄母亲
- 26，DIDI KIRSTEN TATLOW：中国来信——历史的一章被紧紧掩盖（发表于《纽约时报》）

~~~~~

## 【往事追忆】

### 追究卞仲耘惨案真凶

• 敏一鸿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女学生群殴致死，是空前启后的案件，事发四十四年后，仍是热议话题。那场凶杀的凶手是谁？尚未定论。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一直保存着妻子的遗物和相关证据，多年追究卞仲耘案真凶。他致信该校负责人，抗议校方所为，要求撤销宋彬彬“荣誉校友”资格，并表示“伫候回音”。到现在，

没有任何回音。

#### ◇ 师大女附中全体学生名单上网

研究这文革血腥“红八月”第一大案的网友将卞仲耘副校长（当时该校没有正校长）被打死那天，全体在校学生名单公布在网上，是一件有利于寻凶问责的好事。我身为名单中人，受到震撼。我是名单里“初中一九六七四班”学生张鸿敏，一九六六年十五岁。我的校友冯敬兰在《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文中提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去北京站为赴北大荒的同学送行，我就是被送行九人中唯一被称为“初二小孩儿”的那人。（此文署笔名，因在美国媒体工作，以现名张敏发稿，凡署笔名之作，是与工作无关的个人言说。）

《记忆》杂志先后发表《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对于寻求卞仲耘之死真相、深入研究文革史非常有益。当然，我对文中观点不尽认同。例如，校友叶维丽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说“我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当然同意要面对自己良知，但说出真相，追究直接责任者、凶手以至元凶，正是良知的真正表现。延绵六十年以上的群体凶杀，正是以“革命”的名义一再藏匿真凶，才吞噬掉高达八千万人的性命。

追究真凶的第一步是调查、还原真相。卞仲耘校长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在学校锅炉房高台北侧大操场被群殴时，我是现场目击者。殴打卞仲耘是自发还是有人组织、宋彬彬是不是凶手、她对卞仲耘之死是否负有责任？我可以就我所知，略谈一二。

#### ◇ 全校有统一组织指挥、不是权力真空

目前争论焦点之一是七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到八月五日，学校是否权力真空？这关系到卞仲耘之死是学生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发冲动之举，还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凶杀，也关系到宋彬彬是否负有责任。

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取分最高的女子中学，聚集了很多中国政要、统战对象和高级知识份子之女。毛泽东的两个女儿，刘少奇、邓小平之女分别在校毕业和就读。文革工作组，由邓小平直接过问。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红五类”同学进了我家门。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说完转身离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恐怖气氛使“黑五类”人人自危。

八月四日上午，我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当中摆着几排椅子，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类。“红五类”坐在椅子上。九个“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几个出身不红不黑的“灰色”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让她们看批斗“黑五类”，她们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董××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被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董说。“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原来那不是她的生父。董分辨不清，站进我们这排。随后，“红五类”头头的郑重宣布，让我们知道全班同学都被查清了三代。

我们仍被命令继续低头。听到齐唱响起“对联”歌。接着，二十个正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我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于是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

刷大字报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一脚里一脚外，与我们班“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了一会儿。我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八月四日这天，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我们班这样的批斗会。黄××的出现，表明班级的行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指挥。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

#### ◇ 卞仲耘蒙难日的亲眼所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我和许多“黑五类”同学一起被押到操场上看校领导挨批斗，说是“斗黑帮”。八月烈日下的那一幅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

锅炉房高台（常常是批斗会主持者和发言人站的地方）北侧的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强的胡志涛副校长（女）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紫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什么，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

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攘，渐渐乱了队。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长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钉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像中的鲜血淋漓。

关于带钉桌椅腿的记忆，从校友王友琴的记述中得到证实，那是同学从木工房拿来的。谁提示或组织同学去拿的？谁决定这样打校长？

四十一年后，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先生，他保存卞校长血衣至今，确认我记忆中卞校长那天所穿衣服颜色样式质地都没记错。根据几位校友的文字回忆，后来卞仲耘被押到后边小操场干重活，我当时没跟过去。再后来她又被押到宿舍楼里受到各种折磨，因为楼道狭窄，从旁目击者不多。

在大操场上批斗殴打校领导之后，她被带到另外的地方，人群渐渐散去，原来押着我们“黑五类”的“红五类”们也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同学魏××、崔××和孙××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动物和人体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第二天，从学校广播（教室小喇叭）里得知卞校长前一天被送进邮电医院，宣告死亡。后来又得知，其实送进医院前，已经死了。

#### ◇ 打死卞仲耘校长的是不是红卫兵？

卞案争议的又一焦点，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时，学校里是否已经成立红卫兵？卞校长是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这关乎后来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与卞仲耘之死有没有关系。我可以肯定，师大女附中在七月三十一日前就有了红卫兵。

师大女附中因为学生“通天”，文革中事事闻风而动，不会落后。清华附中五月二十九日有了红卫兵后，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四日和七月二十七日的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都一一抄录，在校园张贴。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的信，写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之间。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会议印发了毛的信及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写的两篇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

如果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明确得到毛支持后，师大女附中直到卞仲耘蒙难的八月五日，还没有红卫兵，不是掩人耳目，就是女附中局外人。再看另一方面，现已确认，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七月三十一日已成立。该组织之所以这样命名，是为了区别主流红卫兵。仅以上述顺序论，说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还没成立红卫兵，肯定与事实不符。

至于现在想以“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门前还没有现成的红卫兵袖章为理由，证明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打死卞仲耘与红卫兵无关，更是牵强到完全站不住脚。当时物质匮乏，买布要布票，布票都在家长手里把着过日子，学生一时半会儿弄不到布毫不奇怪。从事实看，八月四日我们班谁能动手打人，谁该被打，泾渭分明，与袖章毫无关系。

一天之后的八月五日，谁有资格斗黑帮，谁被带到木工房拿桌椅腿，谁被押到操场上看以儆效尤，都有一定之规。一如十三天之后，那五十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代表，既不凭袖章，也绝不会靠抽签或自愿报名而定。

早在六月二日停课之后，最初班文革核心小组成立，全由出身而定。最初的红卫兵就是红五类，红五类是当然的红卫兵，自然不过。到七月底八月初“对联”一夜间贴遍北京城，出身决定一切，不是红五类敢冒充红卫兵的，轻则批斗殴打，重则格杀勿论，与袖章毫无关系。

#### ◇ 红卫兵宋彬彬与八一八毛泽东

当然，说是红黑泾渭分明，也不尽然。时有革干子女，一夜变色，父母被揪出来，遂沦为黑五类，“好汉”变“混蛋”，成了狗崽子。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蒙难这天，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提出党中央还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当时国人并不知情，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国家领导人。师大女附中开批判会，有人上台发言，刘女、邓女都在场，她们一如既往高喊“开会发言报出身！”直到八月十八日，刘少奇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上午，毛泽东正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当看见萤屏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我一时完全反应不过来——天上的毛泽东和我们学校的宋彬彬面对面说话？随后，电视台解说员说“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宋彬彬’。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这是“最高统帅”对殴打和杀戮表示认可的确凿证明。毛泽东无疑是红八月杀戮的元凶。

毛与宋这段着名对话，迅速传遍全国。此后，在北京，在全国各地，又有许许多多教育工作者，死在学生的拳脚棍棒之下，更多黑五类死于毒打。校友王友琴以历史义工身份，用二十多年业余时间，记录包括卞仲耘校长在内的中国五百位以上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丧生经过。对王友琴所做的工作，我深怀钦敬之意。王友琴在为一九六六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挽回荣誉。

#### ◇ 宋彬彬应该走出毛的阴影

综上所述，并参看各方证词与研究报告，可以得出如下看法：

一、直接动手杀死卞仲耘的是师大女附中一群学生，而不是哪一个人，当然也不是宋彬彬一个人。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有极大嫌疑。

二、直接动手导致卞仲耘死亡的一群人里，红五类占绝大多数。让当时所有学生平摊直接动手杀人责任，或有意无意空谈良知，仅仅为宋彬彬一人鸣冤，都与公义原则不符。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三位学生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共同贴出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全校以她们马首是瞻，八月五日她们三位仍是学校里具有令行禁止能力的人。她们是否参与群殴卞仲耘的组织和准备？尚无足够证据。

四、最近看到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作部分存疑。因为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当时没有人出来喝阻。

五、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专题是“光荣与梦想”。经中共中央判定文革是“十年浩劫”之后，宋彬彬与毛泽东的蒙太奇，竟被奉为“光荣”，是历史大倒退。宋彬彬分享光荣不辞，分享耻辱就叫屈，是什么逻辑？

六、毋庸置疑，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所有学生都会照常坐在教室上课，卞仲耘会在她的校长室办公。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导致包括卞仲耘在内的两百万？也许高达三百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每一个案，都有直接责任者，应该不懈追究。毛泽东是这场杀戮的元凶和真凶，应首先追究。

因此，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凶，不能不从毛泽东开始。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沾上毛泽东的边，成为在全中国呼唤“要武”的符号，导致千万人命丧黄泉。如果宋彬彬因此蒙受了什么“冤屈”，理应先诉毛泽东，切断与毛绑缚在一起的“光荣”纽带，参与将毛请下天安门、请出纪念堂的义举，宋彬彬才有望走出那张据说曾“让她背黑锅”，也曾“让她无上荣光”的著名照片带给她的一切阴影。

（本文为原稿摘要）

□ 原载香港《开放》2010年八月号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